

# 一、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评估

- ▶ 中国崛起是否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 ▶ 中国崛起是否会重蹈德国、日本、前苏联的覆辙
- ▶ 中国崛起是否会在亚洲恢复“中央王国”
- ▶ 中国崛起是否会导致另一个“美国式霸权”或取代“美国霸权”
- ▶ 中国崛起是否会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构成竞争和威胁
- ▶ 中国崛起是否将导致“中国威胁”或“中国崩溃”

“中国崛起”正在成为国际战略界所关注的课题。西方学者的各种预测虽然明显带有偏见，但也有可吸取的合理成分。他们的观点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参照系，作为我们新国际战略论的起点。

## 1.1 中国崛起是否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舆论（主要是西方舆论）看来，中国

崛起的首要问题是，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将成为对现存世界体系的稳定因素和建设性力量，还是不稳定因素和破坏性力量。根据历史的经验和中国迅速崛起的现实，多数西方观察家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改变现存的世界体系。其中相当一些人认为，中国可能成为现存体系的合作者，但是更可能成为世界秩序的挑战者，甚至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问题在于，中国将如何改变现存世界体系，中国在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将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

所谓“世界体系”是以现实力量对比为基础的，由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构成的，形成对各国行为具有制约力的力量格局和国际体系。由于它在较长时期内的稳定性，使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行为体把它视为某种“世界秩序”。

现存的“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从近 500 年世界近现代史延续和演变过来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和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转变为新兴独立国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国家主宰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接着世界进入两大集团对抗的冷战体系，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对峙、对抗。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纳入了这个冷战体系之中。直到 20 世纪最后 10 年，冷战体系解体。

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是世界体系的趋势。但是，在多极化结构尚未完全形成前，世界体系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特征。美国的超强地位和单边主义行为试图以“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来支撑 21 世纪的世界体系。同时，

旧殖民主义体系和冷战体系的残余结构和力量仍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世界体系的利益关系和行为准则。

新中国诞生以来，其国际地位和国际环境就是与世界体系的这三次历史性转变紧密相关的。它既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作为殖民主义体系和西方主宰的旧秩序的挑战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历史特征成为当代西方大国“中国威胁论”情结的由来，也是中国与现存世界体系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以至某种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在冷战体系中先后与两大集团的领导国家发生对抗，并且长期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成为中国与现存世界体系存在距离和摩擦的更直接原因。同样，中国的任何重大国际行为或重大的国内政策调整，都会对现存的世界体系产生深刻影响。例如，1970年代初的中美关系突破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都直接推动了冷战体系的瓦解。因此，当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升到世界前列时，世界体系不能不发生改变。问题在于改变的速度、方式和程度。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根本上是由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是由这个体系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作用所决定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决定以现代化建设为工作中心；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2001年江泽民主席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重大事件是中国国家利益和国际行为变化的三个转折点。这三次重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与现存世界体系的关系，改变了中国的国际行为准则。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的国际行为主要是融入和适应现存的世界体系，是在以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世界市场上取得我们发展所必需的资源 and 条件，是以世界贸易体制为基本规则来实现内部与外部市场的接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与全球化体系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互依存也大于相互排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进程越是发展，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融合程度就越高，实际上中国改变世界体系的能力也越增强。在此过程中，中国与现存体系的摩擦也会增加，甚至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冲突。但是，这是正常的体制摩擦、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不可避免。

## 1.2 中国崛起是否会重蹈德国、日本、前苏联的覆辙

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其崛起过程以及可能引发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是各国战略界研究的重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在借鉴历史上后起的大国案例时，经常将中国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1920—1930 年代的日本和 1950—1970 年代的前苏联加以类比。通过这种类比得出的一个概念就是“正在迅速崛起而又对国际秩序现状不满的大国”，简称为“不满现状的大国”。

在西方战略学界的观点看来所谓“不满现状的大国”，

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是它们都在较短的时间（20—30年）内上升为全球性或地区性大国，其力量往往达到仅次于原来的头号大国即霸权国家的地位。但是，它们又很难取代原来的霸权国家和霸权主导下的国际体系。因此，它们不满于国际秩序现状并竭力挑战和改变现状。

二是由于“维持现状的大国”即霸权国家担心后起的大国取而代之，通过组织盟国体系或军事集团，对后者进行牵制和围堵，限制其发展空间，从而加剧了“不满现状的大国”的不满。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走向对抗，导致世界大战或冷战。

三是后起的大国虽然力量上升很快，但是其综合实力仍与“维持现状的大国”有较大差距。为了对抗霸权国家，后起的大国一般都急剧扩充军事力量，并在本国周围构筑安全带。这种军事竞赛造成世界范围的紧张局势，并且在一些战略要地和内乱不断的小国引发局部战争，成为世界大战或冷战的前奏。

四是后起的大国都具有不可克服的制度缺陷，如德国的帝制和纳粹独裁体制、日本的天皇和军部体制、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集权体制，等等。这些制度性因素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带动它们的国力上升，但是在长期竞争中就遭到国际国内各种力量的限制和抛弃。其结果无一不是在体制上的失败而导致战败或国家解体。

西方战略界对“不满现状的大国”研究从一般的特点深入到各个国家失败的特殊原因，特别是将其中与中国崛起

过程相似的某些特征加以比较。例如，德国的统一问题是德国崛起过程中的关键因素。19世纪后期，俾斯麦领导普鲁士完成德国的统一，接着进行普法战争，获得对其经济资源最重要的亚尔萨斯-洛林地区。此后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就没有战略对手，欧洲均势被打破，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德国被凡尔赛体系肢解。希特勒为了复仇，再度“统一”德国并且将波兰、捷克、奥地利都囊括其中，由此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某些美英学者认为，如果不让德国如此顺利地实现统一，它就不可能成为两次大战的发源地，欧洲和平就可能维持。他们借此推论，对中国这样的后起大国就不能让它轻易实现统一，才能拖住中国崛起的速度，使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霸权不会受到挑战。

又如日本在远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前苏联在东欧组成华约集团，都曾以反对西方威胁为旗帜，建立自己的卫星国或势力范围。西方战略家们认为，当德国、日本在欧洲和亚洲扩张时，西方曾经采取绥靖政策，结果是轴心国的战略进攻屡屡得手。而冷战期间，西方盟国对前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采取强硬的遏制战略，有效地围堵了苏联的扩张势头。因此，这些战略家们认为，对于后起的、不满于现状的大国，必须实行有效的遏制政策，不能使其在战略上突破现存的格局和秩序。这也正是美国强硬派试图调整其全球战略的重要依据之一。

不论西方战略家们在引用德国、日本、前苏联的案例时，找到多少与中国崛起的相似之处，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

和发展条件的根本不同，无视中国崛起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这些区别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与 20 世纪上半叶列强瓜分世界、20 世纪下半叶两大集团对峙有着根本的不同。21 世纪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确保安全已经明显超过相互在战略上压倒和摧毁的可能性。尤其是全球化潮流造成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利益交叉和融合，在一战、二战前后是根本不存在的。

其二，中国崛起的方式和特点与德、日完全不同。德国和日本主要是依靠军事力量和战争手段，通过侵略和扩张的方式建立帝国统治。中国则通过市场经济的资源重新配置，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中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不断提高来实现其强国之路。

其三，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德、日法西斯制度截然不同，与前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也有根本的不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开放的、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不断进行自我变革的社会主义，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

其四，中国不追求霸权，不寻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在国土以外部署军事力量，也不对别国领土和主权提出挑战。即使是中国本身的统一目标，也尽一切可能以和平方式来实现。

其五，中国的幅员、人口和资源可以支撑较长时期、较高速增长的增长，也可以承受较大规模的外部打击和围堵。因此，中国可以按照自己既定的发展道路来实现战略目标。

但是以往的后起大国在遇到发展瓶颈时，就往往以“夺取国际空间”为理由而诉诸战争。

虽然中国将走一条与德、日、苏完全不同的强国之路，并早已将这个战略公诸于世。但是国际上总是有一些按照强权和冷战思维的人，把以往大国争霸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些后起大国惨败的历史教训作为中国崛起的参照系。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已经落伍，其中极少数人是想从历史上得出一些围堵中国的理由和经验。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他们的某些观察的结论，对我们研究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如何有效地防止重蹈历史的覆辙是有启发的。

### 1.3 中国崛起是否会在亚洲恢复“中央王国”

某些对亚洲历史略有了解的西方学者，很容易把中华民族复兴与恢复“中央王国”联系或等同起来，他们把中国的崛起称为“中国的回归”(The Return of China)指的是中国回归到大唐或大清王朝的盛世。中国在历史上确实是亚洲甚至一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版图曾经覆盖过当今周边许多国家的领土；中国的汉字和文化至今对许多亚洲国家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些西方学者就把这些历史的、文化的因素作为中国将重建“中华帝国”的佐证，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放弃对周边国家的野心。他们把中国崛起与蒙古成吉思汗大帝国横跨欧亚大陆相提并论，实际上是在制造新的“黄祸论”。

这种历史的简单类比不仅与科学常理相悖，而且危险。他们完全抹杀了封建王朝的扩张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之间的本质区别。新中国在建国以来处理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时，总是以“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互利互让、和平解决”的方式，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走向问题。1980年代以来，中国为了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更是主张在领土、领海、岛屿等争端上“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主张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我们决不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甚至不再支持周边国家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东南亚华人华侨以所在国作为母国，成为当地的合法公民。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所采取的政策和行为都是负责任的，没有任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意图。这正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保持稳定的根本原因。

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在促进亚洲多边合作机制方面更加积极主动。例如，中国积极组织和参与了中亚六国合作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国在 APEC 历次峰会上，都对贸易自由化进程作出了郑重的承诺，有力地促进了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最近中国和东盟在“10+1”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取得的进展，更是表明中国与周边邻国的相互依存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安全领域，中国参与多边安全合作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对南海地区的和平开发、对图们江出海口地区和湄公河—澜沧江地区的合作开发，都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可以说，中国正在其周边地区全方位地、多

层次地、多领域地展开多边合作，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恢复昔日的“中央王国”。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概念，只有当周围的邻国都感到安全时，我们自己才有真正的安全。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跨国问题都需要国际合作，尤其是与邻国的合作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处理。中国参与国际合作机制，首先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发展各种合作机制，最终形成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的一体化机制。可以预料，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模式是中国新型对外关系的雏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战略的目标模式。

然而，西方有些战略家无视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合作的巨大努力，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一无所知。恰恰相反，他们了解这些重要的发展进程，散布“中央王国论”正是为了阻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一体化。有些大国的战略决策者们为了编织围堵中国的网络，刻意寻找和放大中国与邻国的各种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试图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引发冲突，使他们获得所谓“力量准入”的机会。针对这种战略意图，中国不仅不可能去恢复“中央王国”，相反只能尽一切可能与邻国发展共同利益和各种合作机制，用一体化的网络来打破围堵中国的网络。那些宣传“中国扩张”的大国最终也将加入到东亚的合作机制中来，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也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

## 1.4 中国崛起是否会导致另一个“美国式霸权”或取代“美国霸权”

提出这类问题最多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的一些战略家们。他们如此关心这种前景，是因为他们关心美国霸权能够维持多久；同时，他们也预感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阻遏。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地说明一下“霸权稳定论”。这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之一。新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认为，由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国际机制的不完整，“世界治理”需要由某个霸权国家来领导或主导。这个霸权国家必须具备领导世界事务的实力和能力，并且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由此形成稳定的世界秩序。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来自其制度的“优越性”和干预其他地区事务的“强制性”。但是霸权国家也不得不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品”而支付成本。其他国家在接受其“公共品”时也接受其领导地位。这就是“搭便车”现象。当“公共品”成本越来越高，以至霸权国家无法支付时，新的霸权国家就会出现并取而代之。如果新霸权国家尚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实力和能力或其“合法性”尚未被多数国家接受时，新旧霸权之间就会展开战略竞争甚至导致战争。旧霸权国为了转移成本，开始与其盟国分享领导权，形成所谓“霸权合作稳定机制”。显然，这套理论完全是为美国霸权服务的。美国也正是按照这种逻辑思维来推论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可能产生的威胁。

但是，中国崛起并不会按照美国霸权的轨迹发展。因为中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与美国崛起的历史条件根本不同，中国不可能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复制一个新的“美国霸权”。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崛起，不是一个向外扩张力量的过程，而是向内集聚力量的过程。这样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运动，它们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作为强国的行为方式必然完全不同，即“霸权式”和“非霸权式”的区别。

首先 中国不具备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那样的国际环境。

美国南北两侧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当时还是殖民地或弱国。当时的世界霸主大不列颠正在忙于与后起的德国争霸，战略重心在欧洲大陆和中东、非洲等地区。美国首先打击的是早已衰败的西班牙，取得在古巴和菲律宾的战略立足点。接着乘英国无暇他顾，法国则财力不足，一举控制了巴拿马运河。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所有的强国都被摧毁或一蹶不振，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的地位。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周边和全球环境要比 100 年前的美国复杂严峻得多。中国周围有日本、印度和俄罗斯三个大国，各自有其大国战略。还有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岛屿、克什米尔、阿富汗等若干现实的和潜在的冲突热点。特别是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准备或正在将其全球军事战略重点从欧洲移向亚洲，在阿拉斯加到中亚的大弧形地带编织“预防性防御网络”。美日联手，企图控制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各个战略通道。在此战略环境中，

中国如果采取与霸权对抗、强行突破的方针，无疑会陷入更加被动、更加险恶的战略环境。

其次，中国崛起的国内环境也与 19 世纪末美国有根本的不同。

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社会遗产和历史包袱的国家，其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和联邦制度在建国初期就已经相当完整。特别是在它成为世界强国以前，已经彻底消除了国内两种经济制度的对立和南北分裂的危险，拥有整个密西西比河以西（大约占美国本土面积  $2/3$ ）的广大发展空间，并且在西海岸获得巨大的财富资源。正是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美国从欧洲吸引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金和技术。美国在内战结束后的 30 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就是以这一整套硬的和软的力量优势为基础的。

相比之下，我们的封建社会历史遗产太重，民主与法制建设远远没有完成。“左”和右的思维模式在不同的人群中发生作用。特别是中国几个重大因素的存在而成为其发展的“瓶颈”：一是人口负担造成的就业压力和老龄化社会；二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三是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恶化。比这三大“瓶颈”更紧迫的是中国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牵涉了中国发展的很大精力。发展和统一两大问题的战略统筹远未完成。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把解答这些难题作为最优先的考虑。而解决这些“瓶颈”决非几年之功可以实现的。

这样就可以比较出中美两国崛起的不同特征：美国在

成为世界强国以前，已经在国家制度建设和资源储备的两个方面做好了准备。美国是在基本解决了国内发展的重大问题后开始对外扩张的。而制度建设和资源开发的严重不足，使中国不可能成为霸权国家。中国必须在崛起过程中解决国内的发展“瓶颈”，同时妥善处理国家的统一问题。

其三 美国自 19 世纪末以来，一直为其霸权进行理论和战略准备；而中国把反霸和不称霸作为自己的国策，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

19 世纪末，当美国的力量还远远没有跨出北美大陆以前已经产生了像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莱的“陆权论”这类以世界霸权为目标的战略思想。进入 20 世纪后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塔夫特的“金元外交”政策、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和“十四点政策”等都已经显示出美国霸权的轮廓。至于小罗斯福对二战后世界秩序和国际组织体系的设计，则构成了当代美国霸权的基础和结构。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历届总统，只是在竭力维持小罗斯福留下的这个霸权体系而已。

然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从来就没有设计过建立霸权（即使是地区霸权）的理论和战略。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但是他在国际战略方面还是以其丰富的国内革命经验为指导的。在 1970 年代以前，中国的对外战略只是为确保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防卫战略和争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三个世界”理论。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战略是为“三步走”发展战略服务，争取到 2050 年保持 70 年和平，使我国有充分的时间实现中等发达的现代化任务。党

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战略思想，还是以保持和平与发展的内外环境作为总体战略目标。有所不同的是，21 世纪中国的对外战略更多地同全球化趋势相结合，把中国的力量增长作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来考虑。

显然，中国在其崛起过程中，战略的指导思想与美国崛起过程战略思维是根本不同的。“反对霸权”和“建立霸权”是这两种战略的根本区别。因此，中国的国际战略不会以取代美国的霸权为目标，也不会试图建立新的霸权体系。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国力，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哲学，更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

## 1.5 中国崛起是否会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构成竞争和威胁

中国的崛起不仅对西方大国是一种深刻的忧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那里也有种种不安。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定位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是我们的天然盟友。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曾经遭受殖民主义剥削和欺凌、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霸权主义干涉和控制。中国也和这些国家一样，对现存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着强烈的改变愿望。为什么还会出现对中国崛起的种种猜忌呢？这同样反映了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复杂变化和全球化引起的世界市场资源重组。

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分析，所谓的“第三世界”、“发展中

国家、“不结盟集团”已经难以构成一个整体力量。

首先，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已经进入“准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行列，他们是全球化分工体系的受益者。一部分是石油富国，其人均财富和消费水平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几十倍之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部分国家已经脱离第三世界，它们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基本上服从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但是，它们中间大多数与中国有较好的经济合作关系，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也不具有对抗性。

其次，第三世界中的一些地区大国如巴西、印度、伊朗、南非、埃及和某些地区集团如东盟，它们在各自地区内已经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有的已经成为地区强国。这些国家大部分与中国保持着相当牢固的合作关系。一般而言，这类国家只有在其上升空间与中国的崛起重叠或受到来自中国市场的竞争压力时，才有可能附和“中国威胁论”。又如东盟国家在 1997 年金融危机后，得益于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对中国崛起持积极态度。但是随着东亚分工体系的中心向中国移动，东南亚产品竞争力开始不敌中国，东盟内部警惕中国的舆论就出现上升势头。可见，这些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并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只是在上升通道的某个阶段上存在着利益竞争。

其三，相当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处于越来越“边缘化”的境地，成为“贫困国家”、“失败国家”或“第四世界”。这些国家多数是中国的长期朋友，他们期待中国能向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和增与。但是，中国目前还难以在物质援助方

面达到他们的期望值。相反，这些极端贫困的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可能是很不稳定的力量。因为极端贫困可能造成长期内乱，政权频繁更迭；其外交关系也难以保持稳定，有可能成为西方大国的某种工具，也有可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显然，这部分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受损者。

尽管第三世界出现如此深刻的分化，但是在总体上，它们与中国的利益共同性大于差异性，他们同中国的矛盾远远低于他们与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基础仍然比同发达国家的合作更广泛更稳固。只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坚持提倡平等互利的合作原则和国际政治民主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将是我们与西方大国周旋的主要空间。中国崛起最终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须保持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关性，以中国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快速增长的通道，促进整个世界的稳定和繁荣。这一点是 21 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的基石。

## 1.6 中国崛起是否将导致“中国威胁”或“中国崩溃”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是一对孪生怪胎。

“中国威胁论”把中国实力无限夸大，进而把中国崛起描绘成一幅可怕的图景，说成是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灾难。“中国威胁论”的“论据”很多，其中有的西方学者用“购